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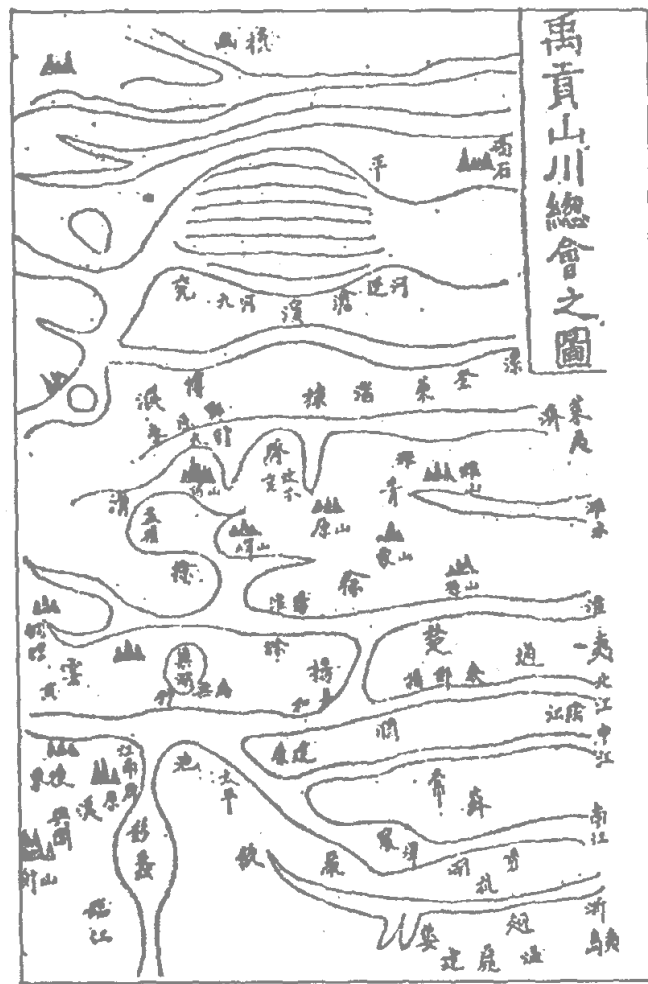
## 为什么说《禹贡》是一部“万世不易之书”？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史书，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相传由孔子删定，实际上有些篇目是后世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即为其一，假托大禹之作。汉晋以来，《尚书》有今、古文之争，但与《禹贡》无关，因为《禹贡》文字在今、古文《尚书》中是一样的。根据目前通行的说法，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禹贡》是先秦时期惟一一部实录性最强、科学性最强、以全国最大一级自然地理区为描述对象的地理文献。南宋郑樵将它奉为“万世不易之书”。明代地理学家艾南英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禹贡》言简意赅，内容非常丰富，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禹贡》全篇无卷数，依其内容可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大部分，仅 1 193 字，却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区域地理的认识。

“九州”为全篇的主要部分，它以荆、衡、岱、太华四山和河、济、淮、黑四水及海洋为分界标志，将全国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扼要地描述了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植被、田赋、物产、水陆运输以及少数民族等情况。《禹贡》在记述各州自然景观时，采用了区域对比的方法。如根据土的颜色将其分为

壤、坟、埴、垆、涂泥等；又综合土色与土质将九州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垆埴等类型。《禹贡》对九州的划分和分区对比的描述，是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对我国古代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人编绘的《禹贡》插图



渭水以北，第二条在黄河南岸，第三条在汉水右岸，第四条从岷山起经衡山至赣北的敷浅原，并且记述了主要山岳的名称、分布特点和治理情况。这种记述显示出当时已有山系概念的萌芽。由山系的记述顺序可知作者已掌握了九州山岳分布西高东低和我国山岳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两大特征。《禹贡·导山》中的山脉体系对我国山系思想的影响达几千年，直到 17 世纪徐霞客以亲身考察才对其做了订正。

“导水”，专记九州的河流。因假托大禹治水，故从上游开始，依次记述了弱水、黑水、黄河、漾水、长江、济水、淮河、渭水和洛水 9 条水系中 35 条河流的名称、源流、流经地势和归宿及其疏导情况。这是我国有关河流水系的最早记录。其中“岷山导江”四个字，左右了两千多年的江源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由其先北方后南方，先上游后下游，先主流后支流的记叙方法看，作者对九州境内的水系已有较深刻的了解。

《禹贡》最后为“五服”。它以 500 里为距离，由王都向四面等距离扩张，依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并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方法及赋役交纳等级。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理制度，反映了原始的大一统的思想。

《禹贡》是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巫风盛行的条件下撰写的。它突破了早期著作中的许多神秘色彩，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评论说：“这部著作中除了禹这个人物的活动以外，丝毫没有写离奇怪诞之事，甚至也没有写幻想和传奇的故事。”它朴实地记录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地理、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多种地理现象，成为中国古代区域地理研究的典范。历代注释、考证甚多，成为

中国沿革地理和经学地理中的一大支柱。其中不少地理概念和词汇（如冀、豫、雍，渭水、汉水、淮河，泰山、华山、衡山等）沿用至今。

## 为什么说《山经》是我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书？

《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古文献（山海经）中成书最早、科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全书共 5 卷 26 篇，共记载山 447 座，总里程达 8.7 万余里，每区一卷，每列山一篇。它先按大方位将全国山脉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 5 个大区。其次，将每区的山分为若干行列，南山经 3 列，西山经 4 列，北山经 3 列，东山经 4 列，中山经 12 列，共 26 列。再次，每列从首山起，依次叙述各山的位置、水系、地形、动植物、矿产和神话传说等内容。

《山经》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所反映的地理学知识也很丰富。

《山经》记述的地域范围已遍及全国广大地区，比《禹贡》所述更为广阔。据谭其骧研究，“南山经”叙述范围，东起今浙江舟山岛（漆吴山），西至湖南沅水下游（柜山），南抵广东南海。“西山经”叙述范围，东起晋陕之间的黄河，南至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望池西北、陕西榆林西北一线，西到青海湖（西海），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翼望山）。“北山经”叙述范围，西起内蒙古腾格里

沙漠，东抵河北中部，南至山西中条山，北达内蒙古阴山以北。“东山经”叙述范围，西起泰山，东至山东成山角，北抵长山岛，南到安徽濉河。“中山经”叙述范围，包括晋南、豫西、鄂西、湖北、赣北和四川盆地一带。

《山经》中记载众多山岳，并已具有“山脉”概念的雏形。《禹贡》仅记 4 列山脉 20 余座山，《山经》记载 26 列 447 座山。《禹贡》仅记山名，《山经》则记叙了山的位置、高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和面积等，而且注意两山的相互关联如距离、方向等。如，“南次二经”中有：“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四方。”由于《山经》有关山岳的记述内容已较丰富和完善，所以一般都将其视为我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书。

《山经》中对河流的记述表明当时已具有“水系”概念的雏形。《禹贡·导水》，仅记河流的少数干流和较大支流的发源。《山经》在指明河流发源的山脉、流向时，还注意到它们的交汇情况，已从单独的河流记述逐渐形成相互关联的水系概念。如“西次四经”中说到孟山“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西白於之山“夹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生水”。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有二三级支流的水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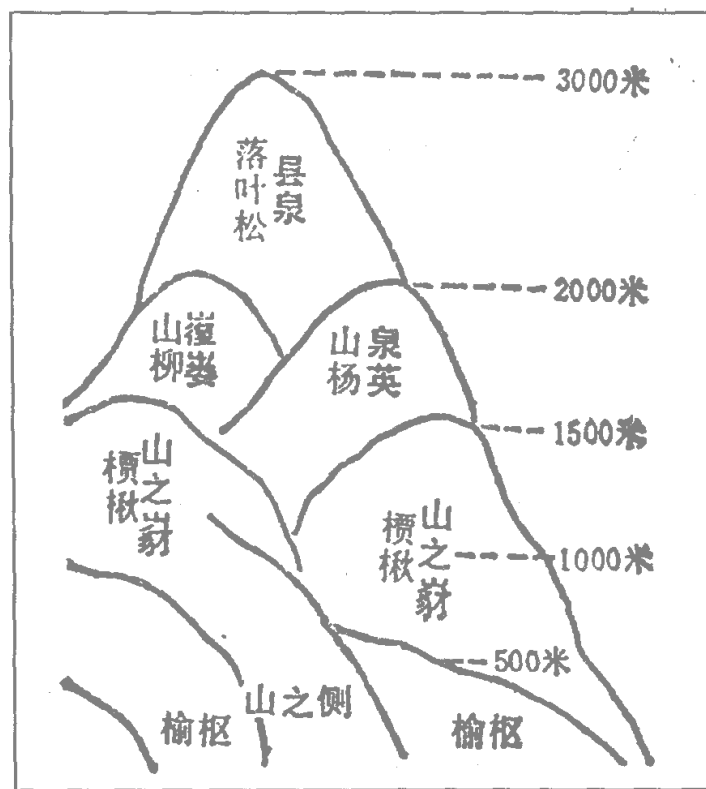
此外，《山经》中还记述了南方岩溶洞穴情况、河水的季节变化、潜流的情况。从书中对各山动植物的记述中，反映出对不同气候带的植被和动物等已有一定的观察。

总之，《山经》这部古老的地理著作，对全国范围内的多种山岳地理现象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 为什么说《管子·地员》是我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专篇？

《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假托春秋早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所编撰。《管子》一书内容庞杂，内含丰富的地理知识。其中的《管子·地员》篇反映了我国综合自然地



《管子·地员》所记植物的垂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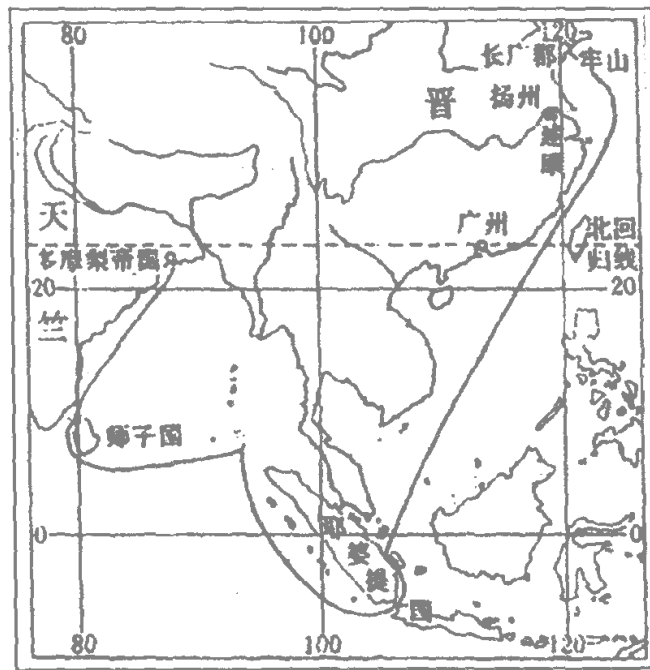
理和土壤地理知识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早期珍贵的地理文献。

《管子·地员》全篇 2 000 余字，前半部分综合记述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识。它将土地分为 5 大类 20 多个小类：一为浍田（即平原），分为 5 个小类；二为延，即蔓坡地，是平原与丘陵间的过渡类型，未再细分小类；三为丘陵，按地势由低到高、地下泉水由浅到深，分为 14 小类，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对丘陵最详细的分类；四为山林，自高到低将山地植被分为 5 个小类，依次为落叶松、山柳、山杨、椴、榆枢；五为川泽，指河、湖、沼泽岸边的土地，以植物为标志分为 12 个小类，首次叙述了小地理环境下植物的水平分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

《管子·地员》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禹贡》最早根据土壤的颜色和质地，将九州的土壤分成若干类。这一分类已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较简单。《管子·地员》的土壤分类在我国古籍中是最系统和最有代表性的。首先，它根据土壤肥力将九州一般地区的土壤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依据土壤的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酸碱性等分成沃土、位土、壤土和浮土等 18 类；每种又据赤、青、白、黑和黄色分为 5 种，共计 90 种土壤。虽然这一土壤分类系统有牵强和虚拟之处，如受五行说的影响规定每种土都有五色。但作为早期人们对土壤的观察、认识的成果，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西方至近代，才对土壤结构、酸碱度与肥力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 为什么说法显是我国最早穿越西域进入印度的旅行探险家之一？

自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北至中亚的交通，虽因政局动荡间有阻碍，但并未完全断绝。相反，在东西贸易日趋繁盛的促进下，文化交流也发展起来。公元1世纪，佛教由



法显航海图

西域传入我国。至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封建割据，百姓饱尝战乱之苦，前途茫然，这为佛教兴盛与发展带来了

良好机会。其时，域外僧徒纷纷进入我国宣扬佛教，翻译经典。国内也掀起到域外取经的浪潮，出现了不少长途跋涉的旅行家。法显是西行求法僧侣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法显（约 342—423），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三岁就出家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叶，佛经虽然已经译出很多，可是戒律（佛教约束教徒的教规）仍不完备，法显就立志西去寻求戒律。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60 高龄的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等 10 人同行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法显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西域越葱岭去天竺。经乾归国、耨檀国至张掖。经敦煌，穿越 1 500 里沙河，至鄯善国、焉夷国，再西南行，沿塔里木河、于阗河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至于阗国。经子合国，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由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再返巴基斯坦，东入恒河流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 年）到达天竺。法显一行在天竺搜求戒律，学习梵文梵语，抄写佛经，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在东天竺的摩竭提（即摩揭陀）国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学习、生活三年。

在游历旅途中，同行僧人有的丧身异域，有的愿留在天竺不再返回。而法显西行的本意在“欲令戒律流通汉地”，所以坚决由海路回国，以传由天竺取得的戒律，弘扬佛法。东晋安帝义熙五年（409 年）法显从印度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附近的泰姆鲁克古时，位于恒河入海口）乘商人海船昼夜兼程 14 天到师子国（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因师子国是南亚佛教兴盛之邦，法显就在这里寻访名山宝寺，继续求法。他在“无畏山”佛寺的供物中“见商人以晋地白团绢

扇供养”于佛像前，引起思乡之情，“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更坚定了回国之念。

在师子国停留两年之后，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九月四日法显从师子国搭乘一艘商人大船回国。船上载有200余人，大船后系一只小船（由于海上航行极为艰难，以备大船毁坏时用）。这艘大船准备横渡孟加拉湾东去。刚一启航恰值好信风，得以顺利东进。没想到，两天后，便遇到大风，船漏入水。商人都想上小船，小船上恐怕人太多，就砍断了缆绳。商人都非常惊恐，就把船上粗重财物掷于水中，法显也把水瓶、澡罐及其他东西掷入大海之中。这样的大风刮了13天，船到一个岛边。潮水退后船漏的地方才补塞修理好，又继续航行前进。海上航行极为艰难。“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鼃鼃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邃，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称此二岛）。”法显在《佛国记》中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航程中有海盗。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观察日月星辰辨别航行方向，在当时远洋航行中的重要作用。那时，还没有指南针，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海船，只见水天相连，只有靠日月星辰导航了。这就成为我国观日航海、观月航海起源很早的证明。到了耶婆提国，因这里“婆罗门教兴盛，佛法不足言”，所以法显只停留5个月，于义熙八年（412年）四月十六日，又搭一艘载有200多人的商人大船，带50天粮食，向东北广州方向

航行。约走了一个月，夜忽遇黑风暴雨，商人们都很惶惧。那时天又连阴，走 70 多天，粮食、淡水都用完了，只好取海水食用。商人们说，平常行驶 50 天就可到广州，现在已过期多日，是不是航工看错了？于是就向西北航行，寻找海岸；“唯任风飘流”经 12 昼夜，“忽至岸，见藜藿（农作物）菜蔬依然，知是汉地”。大家得到淡水菜蔬都高兴异常。但不知是什么地方，有人说已过广州，有人说还没到广州。又乘小船深入内地，等寻到两位猎人，请法显翻译。法显用汉语问他们，“这是哪个国”，猎人说，这是青州长广郡界（今山东崂山一带），属晋地。法显才知道已经回到了故土。后来，他由彭城（今江苏徐州）去建康。

法显历经艰难坎坷，西行印度，寻求戒律，历 14 年，途经 30 余个国家，濒于死者数次，最后只有他一个人远航归国，体现了他那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回国后，他与刚来中国的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一起翻译他带回的大量佛经。义熙十年（414 年）他写出了西行天竺的经历，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高僧法显传》、《三十国记》等），这次西行的成功，使法显成为我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数探险家之一，也成为由陆路去印度、由海路回我国且遍游印度的第一个旅行家。

《法显传》1 卷，计 13 000 多字。该书以精练、生动的文辞记述了法显游历中亚、印度和南洋 30 余国的见闻，内容除介绍佛教教事及其传播情况外，还记载了各国的山水、交通、物产、风俗、社会和经济等情况，其中有许多关于当时域外地理的新认识、新记录。如书中在记述锡兰

岛（当时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时“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当时印度的长度单位，1由延约合4.8海里），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玕，有出摩尼珠地方，方可（约）十里……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这一段文字，既准确地描述了锡兰岛与周围的岛屿分布，又生动地记述了其气候特点、景观状况和农业生产习俗，使人对这个终年炎热、无四季之分的热带国家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如在记述葱岭南北自然景观时写道：“自葱岭已前（指今新疆和田一带），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仞仞。”这一段记载说明，法显对葱岭南北不同的自然景观已有清楚的认识。再如，书中对全部海程的航路航船以及连续三次因季风（书中称“信风”）转换而乘不同方向信风航海均有准确的记述。因此，《法显传》还是我国关于信风和南洋航船的最早最系统的记录。《法显传》是我国详细记述古代中亚、印度、斯里兰卡、南海诸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有关1500年前中印远洋航海的纪实之作。其史料价值极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法显的这次旅行和带回的地理见闻，都极大地丰富了当时我国对中亚南亚地区以及我国与印度之间陆、海交通的地理认识。尤其是保存至今的这部游记，在世界上也是最古老而且内容充实的游记之一。



## 为什么说清代《西藏志》是我国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方志？

清代是我国地理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标志之一就是这一时期边疆地志有了极大的发展，各边远地区几乎都有了自己的地志。远处边疆的西藏，到清乾隆年间也出现了一部地区志——《西藏志》。

《西藏志》，现已不知作者姓名。此志不分卷，记事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书约成于乾隆初年。全书3万多字，分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疆域、物产、发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等36目，叙事详清略古，对山川、道路、语言、风俗习惯记述较为详细。此书虽然行文过于扼要，而且还有一些讹误，但因成书早，被视为第一部正规的西藏地志，受到研究西藏的学者高度重视。其后编撰的《西藏图识》、《卫藏通志》等志书，多从中取材。



## 为什么说《华阳国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史志著作？

东晋常璩撰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史志著作和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的重要著作，备受历代史家重视。

常璩（291?—361），字道将，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州市东南）人。江原常氏是世家大族，世代为官，颇多治学、著述者。常璩少年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后担任成汉政权的史官，李势当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获读宫中图籍档案，接触了大量文献资料，曾撰《梁益宁三州地志》、《蜀汉书》等著作多种。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兵临成都城下，常璩等劝李势归降，所以桓温灭成汉后以常璩为参军，随至东晋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江左重用中原故族，轻蜀人，当时常璩已老，又得不到重用，遂不复仕进，怀愤改写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时或作《华阳记》。《禹贡》有“华阳黑水为梁州”之语，“华阳，梁州地也”，此梁州范围包括今四川全省、重庆全市及云南、贵州各一部分，总体位于西岳华山之南，“山南为阳”，故书以“华阳”为名。全书共为12卷，分为三大部分：卷一至卷四述梁、益、宁三州地理，卷五至卷九记公孙述以来蜀地割据者始末，卷十、卷十一标榜蜀中人物，最后殿以《序志》一卷。此书叙事，始自远古，止于永和三年，同时记述地理、历史、人物，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该书地理之部为全书的精华所在，其为后世所称道与引用的亦大抵不出前四卷，即卷一《巴志》、卷二《汉中志》、卷三《蜀志》、卷四《南中志》。这四卷主要记载当时政区梁、益、宁三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所、山川、交通、物产、风俗、民族乃至名宦、大姓等。

## 7 为什么说《嘉庆一统志》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全国地理总志？

明清两朝，在封建政府的推动下，我国方志走向它的鼎盛时代。明代曾 5 次修总志，而且“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沈庠《（正德）上元县志·序》），为了使志书编修规范化，明政府还颁布了《修志凡例》。清政府曾 3 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并于雍正年间明确规定志书 60 年一修。明清两代，方志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方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繁荣昌盛，也是我国传统地理学走向成熟和顶峰的标志之一。

明清两代有多种官修和私修地理总志问世，其中以《嘉庆重修一统志》最为重要。清代下诏修撰全国地理总志《一统志》共有三次。第一次，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开始，乾隆八年（1743 年）成书，共 342 卷。名义上由蒋廷锡等人负责，实际上由徐乾学总领其事，参加者有胡渭、黄仪、顾祖禹、阎若璩、齐召南等著名学者。乾隆前期，国运昌盛，相继平定了准噶尔、回部、大小金川，而西南土司又相继归附，国家版图进一步扩大，同时内地政区也时有变更，初修的《一统志》内容已显得陈旧，于是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开始对《一统志》进行续修。续修工程历时 20 年，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完成，

共 500 卷。由于主持续修的大臣为让乾隆皇帝生前看到完成的书稿，编纂工作匆忙粗疏，据龚自珍说续修主要问题有 18 处，枝节问题尚且不论（《定庵文集》卷中（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四部备要本）。第三次，嘉庆十六年（1811 年）开始，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完成，工程历时 31 年，共 560 卷。由于三修本始于嘉庆年间，所辑资料又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因此又称《嘉庆重修一统志》（简称《嘉庆志》），《嘉庆志》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旁搜博采，对原《一统志》的内容、体例作了较大的改动。首先是增补记述门类，它在府州之下列 25 门，不仅较唐宋地理总志而且也比《大元一统志》和《大明一统志》的分类更为精细；其次是完善体例，此书虽宏篇巨幅，但内容体制绝少重复。重修时，特别强调“俱须就现在地界而言，不得将从前旧志中所有率行抄复”；另外，对一些地名错、讹、衍、脱作了正补和考辨。因此《嘉庆志》大大超过了初修本和续修本，成为清代《一统志》的代表。

《嘉庆志》以嘉庆二十五年版图为据 首叙京师 后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 22 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以从朝鲜到法兰西的“外域朝贡诸国”。各统部先有总图、总表和总叙 然后以府、直隶厅、直隶州分卷 均各有图、表 各卷分述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等 25 门 天下每个府、厅、州、县的详细内容皆在其中。与《大明一统志》相较，《嘉庆一统志》多出